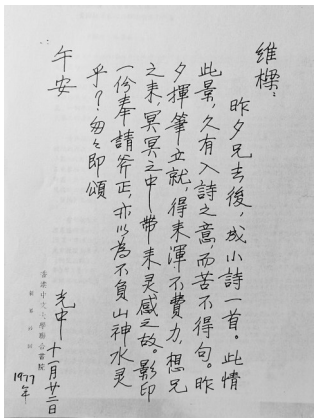




【书房简介】

我的书房有两个,香港的书房称“若衡文库”,深圳的书房称“书厅”。书厅有V字形书架,其后为书桌、电脑桌等,是我的工作间。我非藏书家,书是积累堆叠起来的,书的增加、滋生有如热带雨林。我爱书房里所有的书、报刊、文稿、信件,但这些迟早将离我而去。



余光中致黄维樑的信

那些肆读、细读的时光……

□黄维樑

数十年来读书,除了中学时期的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外,我主要读人文学科的图书,特别是文学的。读得杂,但杂中有序,有重心。

中学时期蒙蒙昧昧,家里和学校图书馆有什么书,我就挑什么书来读。1965到1969年读大学,是我的启蒙时期。上《文心雕龙》课,1500年前典雅的文辞,一读惊美倾心,此书成为我日后治“龙学”的基础。课外读余光中,文星版黄皮书1963年的《掌上雨》、1964年的《左手的缪思》、1965年的《逍遥游》,文章瑰丽博雅不可方物,此三书为我日后的“余学”奠基。读香港作家徐速的爱情小说《星星·月亮·太阳》,发表长文评论之,此书成为我日后研究香港文学的引路之光。

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的校园小,图书馆却相当大气。我课余浏览中典西籍,对杂志兴趣浓郁:《明报月刊》等中文杂志之外,《巴黎评论》(Paris Review)和《文汇》(Encounter)等肆意翻阅。我主修中文,副修英文。刘大杰的《中国文学发达史》——此书为台湾翻印,原书名中“发展”被改成“发达”,以及两千多页圣经纸精印精装的《诺顿版英国文学选集》(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)分别是中英文系的指定教材。中西兼顾,使得我日后的文学研究和评论,常带有比较文学色彩。

1971至1976年,我在美国的俄亥俄州立大学深造,文学理论为我主要用心用力之所在。陈颖教授和Prof. James Battersby都专精于此,论文导师陈颖先生对古典诗词简直倒背如流,两位老师都让我得益匪浅。俄大图书馆高十多层,考试期间馆内提供免费咖啡,学子细品牛吞,为使脑细胞保持活跃。馆藏东方书籍若干万册,我读博期间,天天泡馆,沉浸在中西典籍之中。我的博论题目定为“中国诗话词话的印象式批评”,论述时采用中西比较的方法。馆藏的古今诗话词话数量可观,我浏览了个遍,从中抽样选择诗话14种、词话7种,作为析论的对象。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志清教授非常关心我的学业(我差一点成为他的学生),我告诉他准备怎样写博论,他回信说:“不要自讨苦吃,选择一两种诗话、词话来就不行吗?”我还是照原来构想苦干一番。

我通过中西比较来说明中国诗话词话批评手法的特点,西方的文论自然要尽可能阅读。图书馆里有的是永远看不完的相关书籍,我从古希腊罗马的经典,看到20世纪如艾略特、韦勒克、弗莱等人的著作,不亦苦乎,也不亦乐乎。图书馆影印方便,不像钱锺书在牛津大学“饱蠹楼”(Bodleian Library)那样要勤抄笔记。我不懂拉丁文,更不会希腊文,亚里士多德和朗杰纳斯等人的高论,只能阅读英文翻译。

1976年夏天,我取得文学博士学位,马上回到香港的母校教书。教学相长,教什么就要备什么课。在港中大,我所教以现代文学为主,阅读自然离不开“鲁郭茅巴老曹”诸人名作,徐志摩、闻一多、卞之琳以来的新诗,还有钱锺书的《围城》。身为香港人,我同样关注香港文学,将阅读和评论的结果,集结推出1985年的《香港文学初探》。我的阅读仍然杂,但与教学和研究的主体保持着密切关系。阅读一向是我的乐趣。在香港,教学之外,各种学校内外的文化活动催人而来、逼人而来,我常常觉得开卷肆读、细读的时间不够,十分怀念俄大图书馆宁谧畅读的岁月。

到了21世纪初,我在台湾的佛光大学教书,肆读、细读的时光仿佛倒流而来。佛光大学校园之东是太平洋,古今中外的典籍浩瀚如海如洋。我沉浸于阅读,研究,写作,出



黄维樑,香港中文大学学士,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。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及海内外多所大学教授;著述从首部《中国诗学纵横论》至今年的《香港文学通论》,共三十余种。

版。2014年的《壮丽:余光中论》、2016年的《文心雕龙:体系与应用》,两本书的很多篇章就是在佛光普照中完成的。

时光跳转到最近。我受邀7月在内地一高校开设一个暑期“微课程”,名为“西方文学经典选讲”。目前备课,重读《俄狄浦斯王》《哈姆雷特》等等经典,依旧趣味盎然、收获沛然,十分“享受”。近月,一直在重读旧的拙作、新的拙作,为了要编集出书,或者为了交稿前的“品质控制”,也有“自珍”的因素在。得闲也许就此事写一篇《黄维樑读黄维樑》,作为我阅读史的附记。

【书道】

要精读的书为何,可略读的书为何,因人而异。我精读的书,必在篇页划线显示要点,必加注、加批表示心得或疑难。用蓝色笔、黑色笔写字,用红铅笔划线,用淡黄笔或淡绿笔把佳句、特句涂上色泽。这样,篇篇页页都瑰丽多彩。

【书语】

我阅读,我享受人生。

【近读】

李平:《黄侃〈文心雕龙札记〉研究》(中华书局)
李进:《钱锺书与现代西学》(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)
张向东:《新名词、外来语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》(商务印书馆)
叶琼琼:《隐喻与中国现代诗歌研究》(武汉大学出版社)
徐强:《人间送小温——汪曾祺年谱》(广陵书社)

【自荐】

黄维樑:《中国诗学纵横论》(1977年台北洪范书店)



1977年出版,论诗话、词话,论《人间词话》,论言外之意。印了五次。



【喧嚣之余】宋明辉 美国韦尔斯利学院讲席教授

街市里的斯宾诺莎

与斯宾诺莎的相遇纯属偶然。

在阿姆斯特丹无目的地漫游,走过一条又一条运河,过了许多座桥,天色从夕阳转向夜的幽蓝。在一条小运河、一座桥与街市连接的地方,突然看到了近代西方哲学三大理性主义之一巴鲁赫·斯宾诺莎的雕塑。这是靠近滑铁卢广场的一个角落,斯宾诺莎成长与早期活动的地方。

与其说这是斯宾诺莎的雕塑,不如说是一座纪念碑,高大和庄严。斯宾诺莎身着长袍,看起来是年轻时候的样子,在他的左侧,有一个多面体棱镜,仿佛是提醒他用几何学方式推倒伦理与政治自由的原理,相信万物皆有灵,以及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。纪念碑底座上环绕一圈写着他的名言:国家之所以成立的目的是人的自由。

停下脚步仰看斯宾诺莎的此刻,阿姆斯特丹亮起了灯,渐渐沉入夜色中,泛着黄色的光,这时可以看到他的长袍上都是花与鸟的装饰。斯宾诺莎虽然在世时活得辛苦,死后长久遭到忽视,但他的思想在十九世纪曾经给英国女作家乔治·艾略特以启发,在二十世纪末启迪了哲学家德勒兹。

这时,听到街市的声音,我想到犹太作家辛格的《市场街的斯宾诺莎》:老拉比最终在人生的愉悦中,理解了斯宾诺莎哲学的精髓,他仰望天空,看到宇宙的壮丽,万物的历史,无限的时空。



【拒绝流行】曹林 华中科技大学新传学院教授

关于帝王蟹的争议

南京大学食堂里的帝王蟹引发争议,太正常了!不正常的是,把正常争议上升为“敌情”,让社会包容的阈值越来越低,观念带宽越来越窄。还好,南京大学此次还比较淡定。

大学食堂里出现999元的帝王蟹,无论是特殊的商品,还是特别的价格,注定会引起讨论和争议。学校食堂是把帝王蟹当成宣传点,也就是希望能成为引人注目的“营销点”“传播点”“新闻点”——什么叫新闻?狗咬人不新闻,人咬狗才叫新闻,不同、反常、特殊才容易成为新闻,这注定了那些容易成为新闻的事件包含着一定的冲突性、争议性、讨论性。当把999元的帝王蟹写在食堂菜单里,应该预见到可能的争议性。

每个人的站位不一样,对这只999元的帝王蟹判断必然就不一样。帝王蟹这个“事实”,有无限多的“阐释角度”,尼采说,没有事实,只有角度。——不同角度的折射中,有的学生看到的是“学校体贴学生”“花样宠学生”,食堂表达的是“食堂提供的多元选择”“平价之外的特殊选择”,有的网民质疑的是“是否悖离大学食堂的公共属性”,有的教育者担心的是“是否会引发消费攀比”。比较参照系也迥异,有的看到的是“比外面的帝王蟹价格低多了”,有的看到的“比学生的日常消费高多了”“是我过去一个月的生活费了”。

这就是角度,每一个角度都有其合理性,关于999元的帝王蟹,这不是对与错、是与非、事实与谣言、真理与谬误的交锋,而是不同站位和认知下“一种合理性”与另一种合理性的冲突。保持开放、自信与对话,保持对彼此合理性的尊重,让那根“敌情”的神经松弛下来。



【昙花的话】尤今 新加坡作家

难缠的游客

到撒哈拉大沙漠旅行,旅程异常艰辛。一路颠簸风沙中,导游迈赫迪聊起他多年来接待过的游客,感慨万千地指出:“游客的素质参差不齐,有的通情达理,很好相处;有的却任性难缠,令人哭笑不得。”

他举了几个难忘的例子。有一位美国游客,进入沙漠腹地后,一天到晚嚷嚷要吃香蕉。迈赫迪苦笑道:“这好像叫我去沙漠找个喷泉给他观赏,一样难啊!”那名游客不依不饶,一再坚持地说:“只要你肯找,一定能找到!”在寸草不生的沙漠,迈赫迪为此事愁白了三千烦恼丝。最终,那位游客在反馈表上写下“服务不佳”的差评,让他白白受了委屈。

又有一位意大利游客,到了午餐时间,看见迈赫迪所准备的长棍面包、熟鸡蛋和奶酪,皱着眉头抱怨:“我想吃意大利馅饼。”迈赫迪摊手叹气:“就算我是魔术师,也没有办法在这漫天黄沙的地方变出一个馅饼呀!”

还有一对英国夫妇,行至荒漠深处,妻子忽然内急,坚持要迈赫迪带她去“公共厕所”。在横无际涯的大漠,哪来的公共厕所啊?

迈赫迪叹道:“平生第一次远行,对异国的风土人情一无所知,却仍旧执着于原本的生活方式。结果,既苦了自己,也为难了别人!”

● 随手拍 图文周宗毅



【梅川随感】陈子善 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

李叔同与贝多芬

李叔同是中国近代杰出的佛学家、美术教育家、戏剧活动家;贝多芬是德国伟大的作曲家,有西方古典音乐“乐圣”的美誉。贝多芬逝世五十三年之后,李叔同出生,两人之间会有什么瓜葛吗?

第一位向国人介绍贝多芬的,正是李叔同。1906年2月,时年26岁的李叔同,在日本以“出版部公益社”的名义编印了《音乐小杂志》第一期。这个刊物部分被运回上海发行。正是在该刊上,李叔同以“息霜”为笔名,发表了他据日本石仓小三郎《西洋音乐史》“删窜成之”的《乐圣贝多芬Beethoven传》。

在短短六百余字篇幅中,李叔同介绍了贝多芬的生平、音乐创作的分期和他的代表作。他认为贝多芬“天性诚笃,思想精邃”,其音乐创作“心力真挚,结构完美”;贝多芬的众多作品中,钢琴奏鸣曲“殆称绝技”,而九部交响曲也“为世传诵”。

本周,我到温州大学讲“贝多芬与中国现代作家”。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出家后,于1921年到温州定居长达十二年之久。他在温州完成了重要的佛学著述《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》,参编了《护生画集》《清凉歌集》。温州,是李叔同佛学思想和宗教艺术实践的成熟地。

因而,有机会在李叔同长期生活过的温州,追述李叔同与贝多芬的这段鲜为人知的因缘,真是一次难得的奇妙的体验。

夜幕降临,天河体育场灯火通明,锻炼者在跑道上挥洒汗水。不远处,巨幅屏幕循环播放着全运会的宣传片,点亮广州的夜空。

随手拍专用邮箱:ycwbwyb@163.com



【夕花朝拾】杨棹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

重新解释“当代文学”

《当代文学十六讲》是讲稿,但洪子诚之作,一向有讲稿胜于专著的美名。不止一人讲过,香港版《中国当代文学概说》胜于后来用作全国大学教材的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,盖讲稿更便于讲者自由发挥,更利于单刀直入问题。简单说,讲稿更见出讲者性情,也更见出讲者功力。

《当代文学十六讲》从1949年论及上世纪80年代,正是洪子诚用力最深的阶段,也是他亲身亲历的阶段。换句话说,个人的成长与历史的成长同步。洪子诚一直在高校读书、教书,不曾身列工、农、兵行列,在某种意义上避免了知识特区与信息茧房的干扰,这给了他更好地观察文学史的角度。

洪子诚在第一讲里讨论《疑窦丛生的“当代文学”》,提出“现代文学”替代“新文学”,是为“当代文学”的生成给出空间。或者说,是“当代文学”创造了“现代文学”。这个说法比较拗口,却反映了作者的洞见:“新文学”是一种性质的界定,而“现代文学”则兼性质和时段而有之。“当代文学”明确了现代文学的下限,也将“现代文学”的性质标示了出来。

洪子诚说,“当代文学”就是“国家文学”,这一定义很好地阐释了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提出的“一体化”概念。事实上,这是统摄全书的观念,后面的十五讲,要在这一基础上加以理解。



【不知不觉】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执行主编

相思湖畔

蛰伏数月,出门去南方的南方,广西南宁。

每次来差不多都是节气上的冬季,而满目的热带树木却郁郁葱葱,永远繁茂。“相思湖”是一个人工湖,与邕江紧紧相邻,湖畔深色浅色的绿幕里,生长着灌木和乔木,点缀着红花和红花。湖里游弋着一些野鸭。每逢漫步,那些美丽的诗句,想必会隔空回响。

这次是参加广西民族大学第二十二届“相思湖”文学奖的颁奖典礼。台上一等奖的获得者正热切阐释她的文学理念,她的写作。于是我想,文学的光芒,很难简单描绘,但有一点是,文学拥抱生活,又拓展了生命,说不清人生的哪一个至暗时刻,她会点亮你的灵魂,让你与世界发生勾连。

早年,看到过一段话,说古希腊那些比例优越、外形俊美的雕塑,是想留住一个人十八岁到二十一岁的美好青春。其实,青春不只是生命的一段时光,更是心灵上的一种流动状态。来自每一个学生求知的本能和内敛于心的尊贵,才是一切美丽的来源。

文学会迭代,但文学更需要长期主义、需要坚持的事业。唯有热爱,才能坚定内心,让文学的路,走得更远。无论何时,我们读到的那些触动人心的文字,给生命提供本质的诠释,它们顽强地穿透具体的黯淡,成为虚空里那颗灵魂最耀眼的标注。这是人类精神层面永恒的寻求。